

世纪之梦

汪 澜 ● 编

Wang Lan
Blan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旧梦新语
- 名人言梦
- 凡人说梦
- 旧梦重温

*Shiji Zhi
Me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梦

汪 澜 编

上海人民出版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钱 进

邵 敏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世 纪 之 梦

汪 澜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图书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字数 90,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943—6/G·266

定价 5.70 元

梦之今昔(代序)

钱理群

二十世纪末谈“梦”，不能不感慨万端。

时光仿佛回到100年前：1899年12月31日的夜半，正是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刻，梁启超坐在从日本驶往夏威夷的海轮上，挥笔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两年以后（1901年），他又写有《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预言“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傲诡，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这可以说是本世纪的第一个梦。

梁启超确实不愧为开天下风气的一代宗师，他的“梦”几乎笼罩了20世纪的中国；而且，正如他所预言，20世纪中国的“哲者”、“勇者”几乎无一不具有“梦”的制作者与实践者的双重品格。成功地领导了发生于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

国”的孙中山即是20世纪中国第一大梦想家，50年代当毛泽东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引为根据的，就是孙中山在世纪初所做的“梦”。“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具有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早期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时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未来的梦》，据说他和朋友聚在一起就“畅谈梦话”，而且“谈得醺然欲醉，真是想得令人觉得犹有余味”。到了本世纪的30年代，当《东方杂志》发起“新年梦想”的征文时，不仅得到100多位文化名人的热烈响应，而且在普通读者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一个侧面。30年代就写有《画梦录》的何其芳，在40年代的延安又发现了一个理想的“说梦”的世界：“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我的梦从那种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有的梦渐渐变得接近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梦，贫穷者的梦，饥饿者的梦……我和这些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梦，一边忍受着当前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人共命运”（《一个平常的故事》、《饥饿》）。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信

息：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哲者”、“勇者”，“忍受着当前的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做起“梦”来并且初步实现了“少数”知识者的“梦”与“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梦”的土壤上，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梦想家”（就其“梦”的大胆与影响而言）毛泽东，并由此开始了由他率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而奋斗、牺牲，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毛泽东时代”。这对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中国人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从50年代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到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全中国变成亦文亦武、亦工亦农亦商的大学校”及“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梦”，其“波澜傲诡，五光十色”，其历史进程中的“壮举”，历史回顾中的残酷、荒诞，确实让举世瞠目，也足以使后代人失色：梁启超在本世纪的预言竟以这种方式得以实现，这荒诞能让人感到历史的无情与不可思议。因此，当80、90年代的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与义无反顾的勇敢精神，做起“发财梦”来时，不能不产生“历史似乎重演”的幻觉。而《文汇报》“文化天地”在60年后重新发起“梦想未来”的征文，有5000多位文化人和普通

读者，“追随”当年100多位文化名人，“续写下新一页‘梦’的篇章”：这20世纪90年代的又一个“典型文化现象”，同样令人感慨系之，忧喜参半。

我们事实上已经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一部20世纪中国的历史。鲁迅在20年代早有语云：“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以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白的梦”。（《梦》）这连续不断的“梦”的追寻，追寻过程中“身热头痛”的焦躁、痛苦，以及最终也不肯放弃的“你来你来！明白的梦”的急切呼唤，都典型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正是这近一个世纪的“梦”的追寻与实践，形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中国国民的某种“梦想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本无须讨论；但如何对人作出历史的评价，却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与仔细的辨认。

比较容易把握的，自然是它的正面价值：所谓“梦”的追求，本质上是对超越现实与人自身局限

的精神性的追求，说到底，它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梦与诗歌、神话、传说（以至所有的文学艺术）以及宗教，具有同一本质（特性，功能），都是虚构（想象）一个“彼岸世界”，来满足人在“此岸世界”所不能实现的欲求：人之为人，既要是踏在现实的大地，又要飞翔于理想的幻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拉斐尔有一幅题为《雅典学派》的名画，处于画面中心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位手指天空（天堂），一位手指大地，其实正是表现了对人的两种基本需求，或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侧面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自觉追求。因此，当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在获得“人的自觉”时，他们必然要同时追求人的“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协调，全面发展，而反对封建传统对人的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压抑。于是，我们在写于本世纪初（1908年）的鲁迅《破恶声论》里读到了先驱者对于“宗教”、“迷信”以及“梦想”的如下有力辩护：“夫人在两间，……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

之至上者也。”直到“五四”时期，鲁迅仍在热情地呼唤“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的“大旷野的精神”（《〈狹的笼〉译者附记》）；在鲁迅看来，只有在“梦”中，“人”才真正挣脱了人世的物质的、精神的“狹的笼”，进入“天马行空”、无拘无牵的自由境界。周作人则强调，儿童（与人）的想象的、梦幻的世界必定是“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非现实的”，这些都是健全的“人性”所需要的，“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儿童剧》）。他甚至说：“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镜花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上述先驱者对于“梦”的辩护与呼唤，正是对人性的健全发展的呼唤，它本身即构成了本世纪“人（中国人）的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中国历来是个少梦的国族，因为生活严峻，有时甚至是严酷，所以大家都很实际，不敢做梦”（陈凯歌语，见1993年4月14日《文汇报》）；到了20世纪，中国人终于浪漫起来，大大地做了一回又一回的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说到底，一个不会做梦的人是可怜的，一个不会做梦的民族是可悲

的：放弃了“梦”的诱惑与追求，就意味着对现实的默认与屈从，也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变革现实的实践，永远爬行于贫瘠灰色的现实上的个人与民族是绝无希望的。当年毛泽东提出他的大胆的（在后人看来不免是荒诞的）“梦想”时，能够迅速地变成亿万人的实践行动，这里的“奥秘”自然十分复杂，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但他的“梦想”确实诱发了（唤醒了）潜藏沉睡于人（亿万中国人）的本性中的浪漫主义激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最大的梦想家、浪漫主义者的毛泽东，其人格与精神的魅力，也正是源于人的这种“梦幻”（超越）本性。

但是，任何一个有现实感的中国人都不会（也不能）忘记：在20世纪，我们的国家、民族，以至我们每一个家庭与个人，为这些“梦想”，为这些“浪漫主义激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发生在我们国土上无数惨烈的悲剧与荒诞剧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美丽的“梦想”（预设）与丑恶的后果，天堂（乌托邦）与地狱，天使与魔鬼，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原只有一步之遥，或者说，仅是一块银币的两面。于是，我们不能不正视“梦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等）的负面意义。

为了使我们的思考(讨论)深入一步,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前面已经说过,周作人曾指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而最能显示“五四”知识分子“梦想家”气质的,无疑是风靡一时的“新村运动”,而周作人又告诉我们,“新村社会”也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日本的新村》),这就是说,本世纪初的乌托邦“梦想”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大同”梦想是一脉相承的。但进一步的考察却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差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家乌托邦的大同世界,始终作为一个虚构的、并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纯粹理想境界(也就是后来鲁迅在《破恶声论》里所说的,与“有限相对之现世”相对立的“无限绝对之至上者”),高悬于彼岸世界,仅仅作为对此岸世界进行批判的参照,并不试图(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是永远“可望”(可以趋进)而“不可及”(不可能达到)的,儒家又同时设计了一个“小康社会”作为“行事”的具体现实目标,也就是说,在传统儒家那里,不为实现而设的“梦想”与可以实现的“目标”之间是有着严格界限的。后来康有为写《大同书》,尽管在传统的大同理想里注入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但他仍然沿袭

传统儒家的思路，强调“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孔子改制考》），或者如梁启超所说，他“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还竭尽全力以抗抗遏遏”（《清代学术概论》），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至善至美”的“理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梦”）的虚构性，彼岸性与非现实性（不可实现性），非功利性。但是，传统儒家与康有为的这种“谨慎”态度却是20世纪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刚刚走出民族自我封闭的死胡同，卷入了世界性竞争场，面对着“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酷现实，他们一方面满怀着“怨愤”，迫不及待地要求改变自己（民族、国家、个人）的落后地位，一方面又事实上仍然不能摆脱光荣的祖先留给他们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幻梦的蛊惑，于是，就为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躁情绪所裹挟，渴望着创造“超越”的奇迹：不但在极短的时间，“飞越”过西方世界几百年走过的路程，而且要在“地上”建立起“天堂”——把悬于彼岸的至善至美的乌托邦理想拉到此岸的现实世界中，将“梦想”直接转化为现实。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乌托邦理想（梦想）的虚构性，彼岸性，非现实性，非功利性，相信可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愿

望)与主观能动作用群体实践(开始是小团体的实践,以后发展为亿万人民的实践)的,将其现实化、此岸化与功利化。这确实是一个空前大胆的“梦”,同时又是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梦”,“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即是把乌托邦梦想现实化的第一个试验。后来,尽管人们又宣布了对“新村”运动的扬弃与超越,但实践证明,所扬弃的仅仅是“新村”运动所选择的“和平改造”的具体道路,而“新村”运动将梦想现实化的基本追求(思路)却依然支配(影响、蛊惑)着志在变革的中国的“哲者”与“勇者”。于是,“五四”时期新村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实践者,三十年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毛泽东,终于在20世纪中国的50、60、70年代,以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魄、规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将乌托邦梦想变为现实的试验,尽管在试验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及他所率领的亿万中国人都表现出极其可贵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却不能改变试验前提的根本谬误:至善至美的梦想只能是虚构的存在,它不可能变为现实;如果硬要泯灭“彼岸”的梦幻世界的理想追求与“此岸”现实世界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或者将“此岸”世界“彼岸化”,导致对现实的粉饰(美化)、满足与妥协,或者将“彼岸”

理想“此岸”化，陷于主观盲动、冒进，带来与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灾难性后果。而在中国的条件下，这种将“彼岸”理想“此岸”化的浪漫主义的大胆“梦想”，一旦与不受限制与监督的权力结合起来，其灾难性后果就必然达到空前的规模与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显露出其狰狞可怕的“另一面”。而且，这并非理论逻辑的推测，已经是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无可回避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在20世纪末，重新谈起这个曾经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激动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与亿万人民的“梦”的话题时，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并充分地吸取这一历史的“教训”呢？鲁迅曾经沉痛地指出，中国原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如果我们在面临着新的大变革、大变动的历史时机（这是20世纪给中国人的最后一个机会），并且展望21世纪时，真的“忘却”了20世纪的这个最令人痛心的教训，重走历史的“老路”，那我们将如何面对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牺牲者以及劫后尚存的我们自己呢？如果我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实利主义的冰水之中，根本否认梦想，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追求，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因此，20世纪末谈“梦”，我只有两个愿望(梦想)……

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不放弃虚构的、彼岸的，非现实，非功利的“梦”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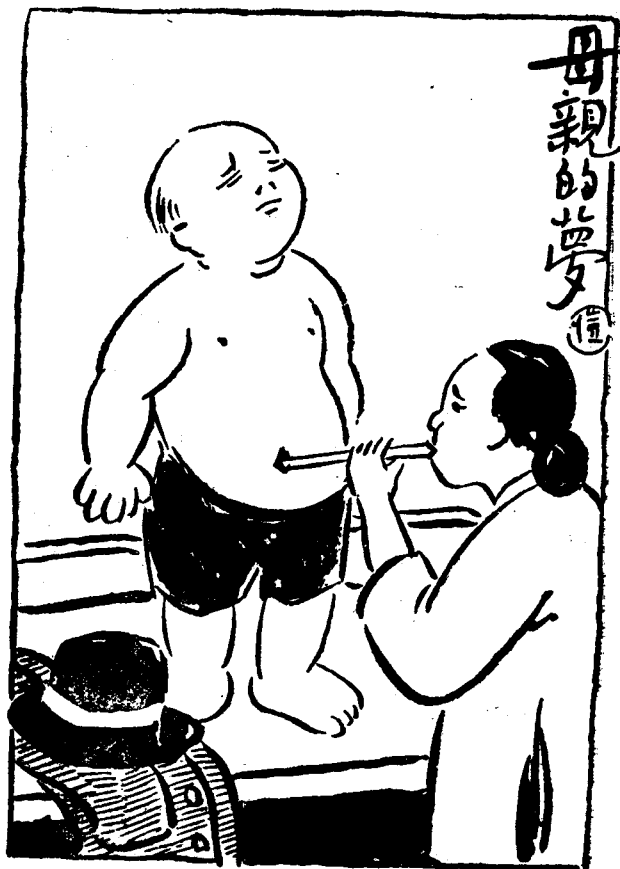
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不要做将“梦想”现实化的“白日梦”。

1993.7.22—24



(丰子恺)

母親的夢



(丰子恺)